在日本古典诗学中,“诗史”一词具有多种涵义,与中国有所不同。首先是作为诗歌发展史的“诗史”。如明和八年(1771)出版的江村北海《日本诗史》乃是日本第一部汉诗史,其与江村北海稍后出版的《日本诗选》及续编,一为诗史,一为诗选,配套而行,相得益彰。其次是作为咏史诗的“诗史”。如赖山阳的《日本乐府》、菊池晚香的《瀛史百咏》、秋月种树的く诗史》,皆为此方面的杰作。再次是作为评述时事人物、咏叹个人际遇的“诗史”。如记述1894至1895年日清战争の的众多作品、马场六郎收集幕末志土诗作而成的《忠烈诗史》。中国的“诗史”通常是指上述三类中的第三类,即当代史的书写。

【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第一类的诗史？】

在中国诗学语境中,“诗史”概念自产生起就和史学、经学有着天然的渊源,孟棨《本事诗》所谓的“推见至隐”即来自司马迁对五经之一、史学著作《春秋》的评价。中国历代“诗史”理论许多都是围绕诗歌与经史关系而展开讨论的,这在日本近代“诗史”阐释中有着广泛的共鸣。

筱崎弻此论虽为赖山阳咏史组诗《日本乐府》而发,但其巨大的理论概括力完全可以覆盖当代史书写的“诗史”。所谓“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”,是以《诗经》为准则衡量“诗史”是否以比兴手法达到美刺目的;“取舍皆能不畔麟经之褒贬”,是以《春秋》为准则评判其材料取舍是否符合褒贬原则。“诗史”必须同时具备诗、史、经三要素(并非以诗代史、以诗代经),如能做到,则可使读者“自诗进于史,自史进于经”。在诗史关系中,史为本位;经史关系中,经为本位:三者价值层次不同,但又融于“诗史”之一体。“自诗进于史,自史进于经”是对读者的殷殷期待,更是为“诗史”创作树立圭梟。诗与史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类型,“诗”如何进于“史”?从日本近代“诗史”的创作实践及理论闻释来看,“自诗进于史”就是诗歌通过履行史的记录、评价功能而进入史的行列。当然,“诗史”也会因其诗歌文体特征而与通常意义上的史有所不同。

“诗史”的“自史进于经”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着眼于“诗”的特殊体性,将其纳入《诗经》谱系之中,重在彰显“诗史”的教化作用;二是着眼于“史”的鉴戒功能,将其纳入《春秋》经的谱系之中,力求发扬“诗史”的褒贬传统。上述筱崎弼以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二经作为评价赖山阳《日本乐府》的标准,充分说明他对“诗史”地位的推崇,对《日本乐府》的期许:读者通过学习涵咏赖氏“诗史”之作,成为符合儒家教义规范的人。

【诗史与诗经，乃至经学的关系？】

在诗、史、经这三者关系上,日本近代“诗史”的终极目标是“经”:以“诗史”建构人心,培养忠君爱国、维护天皇统治的皇民,而浮靡迁阔、败坏人心的清诗则与之相反,必须引起日本汉诗人的警戒。

与中国“诗史”决然不同的是,日本近代“诗史”渗透着强烈的“国体”意识,而“国体”的灵魂则是维系“万世一系”的天皇统治。

“进于经”是日本近代“诗史”创作的终极目标,这并不是说“诗史”等同于经,而是说诗人以经的原则指导写作,读者接受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的熏陶, 成为尊皇爱国之人。